

陈玉辉:事业文章皆见重 御史清名垂万世

核心提示

陈玉辉(1564—1622),字达卿,号荆碧(又作荆璧),惠安县辋川镇后坑村烧厝人,是明嘉靖末至天启初惠安一位名宦。其居官勤慎,刚正清廉,有“铁面御史”之誉;更轸恤民瘼,爱民如己,终卒于任,为文人从政之范。今循其宦辙,读其文章,想其丰采,遂有高山仰止之思。

双亲训诲 砥砺成才

陈玉辉在《封孺人先慈郑氏行状》中称,其家是从惠安城内南门积庆里迁至辋川塔山,再迁于鼓山下。在陈玉辉出生前,家中穷困异常,仅陋屋数椽,难蔽风雨,麦菽也只够十日之用。父亲陈霖(又称迁东公)因为要承应城中的里役差事,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县城里。有赖于母亲郑氏辛苦操持,日夜纺纱织布,家境才略为宽裕。

年少时的陈玉辉无忧无虑,常与玩伴嬉戏、喂牛。父母后来将他送入距家二里的东庄私塾学习。一日,玉辉趁私塾先生不在,跟着玩伴下塘摸鱼,弄得浑身污泥。回家后,陈母泣然落泪:“汝不尽心力学,将来如何安身立命?”隔壁老妇在一旁听闻,窃笑其黄口小儿难以飞黄腾达。陈母愤甚,奋刀自断未指,暗誓定要督促儿子读书成才。陈父见状,便将陈玉辉送到更远处求学。经过一段时日,陈玉辉渐渐能执笔作文,并且通览各家著述。

陈父也未曾缺席对儿子的教导。陈玉辉在《封侍御先府君行状》中称,其年少时最喜欢读班、马、庄、列诸书,所作的文章“荒唐莽荡”,几近恣肆无羁。父亲十分忧虑,便命他诵读效仿宋儒张载、朱熹等理学大家,其文风才渐渐得以收敛,归于平实。之后,陈玉辉又陆续师从邑儒陈学铨、曾孔造、何一橙等人,学问日进,游道日广。他虽历经屡试不第,然终于万历二十八年(1600)高中举人,翌年(1601)联捷成进士。

父母的训诲并不止于其求学和考取功名之时。陈玉辉授吉水县令即将赴任时,陈父谆谆告诫须“惟清、惟慎、惟勤,惟岂弟君子,民之父母,无以家为念,为先靖隐羞”;陈玉辉携母就任期间,陈母每天也总会在其退堂后问他“日所享平几何,所全活几何”(意即是否明辨是非,有没有救下无辜之人)。双亲时时督责,奠定了陈玉辉清廉从政的底色。



陈玉辉画像 (陈伟忠 供图)

初仕文江 布令严明

文江,即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,是陈玉辉踏入仕途的第一站。在任6年期间,他“每莅事,夜分始退”,布令严明,执法不阿,加之性好问察,建树颇多。

一是严催通负钱粮。陈玉辉上任不久,面对的首要难题,便是要解决民户积年恶息拖欠且拒交应纳税钱的严峻局面。当时城内权贵隐匿赋役,“尽将钱粮侵费,贿结胥吏,以为倚援,临征雇募代责,月挨一月,年挨一年。”前任县令对此皆“噤莫敢问”,而陈玉辉却未退缩,坚持按照定则清查催征,并发动有识乡先生带头先期完赋,最终妥善解决了“钱粮通负”的问题。同时,他还轸念匠户之困苦,按籍分等,降免税收,坚决杜绝摊派,甚至自行捐俸为匠户代交税赋。使得“征解收支之数咸洞悉之,吏无所滋弊”。

二是严纠争讼之风。陈玉辉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处理好当地士子的缠访纠闹。当时,“邑故七百弟子员,积傲成风,玩弄有司于股掌之上,不论金印牢鞬,冠绅排闼直入,从则意得,不从则啧啧烦言。”对此,陈玉辉十分愤慨,对这股生员挟制地方的不良风气,他一方面隆之以礼,另一方面“不得不以法惧之”,数月下来,健讼士子皆彬彬归正。

三是绸缪救荒之策。明万历年间,旱灾频发。为防患于未然,避免饥荒蔓延,陈玉辉十分重视筹划赈灾事宜。他提前摸底各乡贫富与义仓积谷,由都长劝令富户纳谷备赈;放赈时亲自监督,防止胥吏作弊,严防饥荒蔓延。

四是严守保甲之法。为弭盗安民,陈玉辉在《严保甲议》中提出了实行谨稽查、除民害、禁窝宰、清奸藪、严连坐、预铃束、均轮直、禁夜行、防夜警、庀器械等措施方法,皆贴近现实且易于操作,从而有效维持了地方安定稳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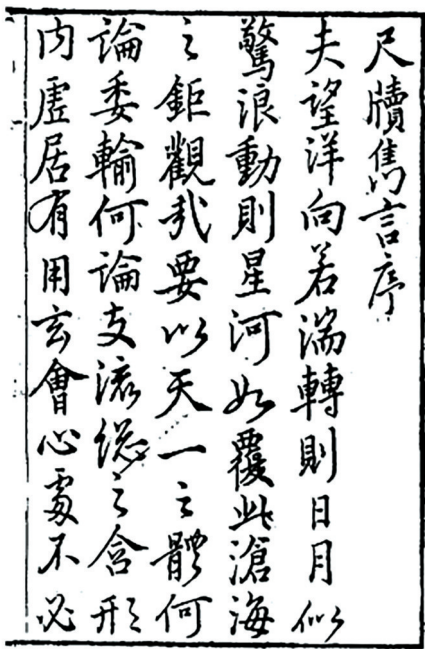
除上述作为外,他还割俸插松万株于太平山,手书界址交付僧人看守,严禁乡人砍伐滥采;倡修城隍庙,与民对半捐俸,历经余年建成。他曾自言:“居官三令五申,晓谕士庶,不如一事之利,貽士庶无穷之益。”对照其具体施政,可知陈玉辉言行始终如一。后来,吉水县民有感陈玉辉造福之功,祀其于名宦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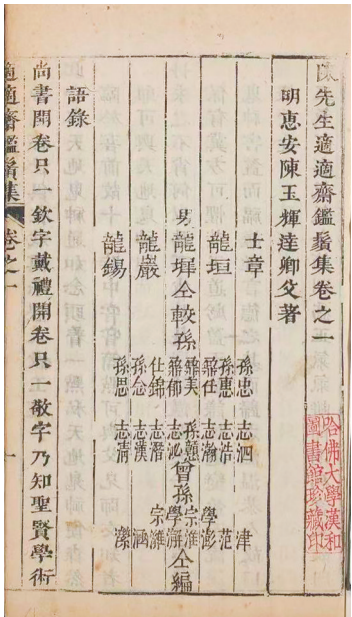
洛江区仙公山陈玉辉《游半山》石刻诗 (陈伟忠 供图)



惠安科山公园陈玉辉《偕诸友游登科岩》石刻诗 (陈伟忠 供图)



陈玉辉书《尺牘雋言序》(刘晓平 供图)



陈玉辉《适适斋鉴须集》书影 (康熙十一年刊本)(刘晓平 供图)

擢升御史 剔奸除弊

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)前后,陈玉辉因政绩优异,擢升为兵部车驾司(一作吏部)主事,不久后便又转任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,巡视西城。此时的大明王朝,皇帝怠政,内阁空悬,内部党争剧烈,政令废弛,又加上灾害频仍,财政弹尽。陈玉辉不因官微而噤声,直言不讳,敢于上疏谏议。

任职之初,他首上《几务从陞时事多艰疏》,疏中以古今对比的方式,列举神宗皇帝与明朝开国以来历代帝王的作为差异,批评神宗皇帝“深宫静摄,唯逸豫是娱”,规劝其励精图治;后又上《储教久虚疏》,就人多讳言且不敢碰触的“国本问题”直言进谏,请求神宗皇帝允许皇太子正式出阁,接受儒臣系统讲授经史。此两疏见载于《螺阳文献》卷一,其言恳切且直截了当,从中可见陈玉辉公忠体国、拳拳报效之心,及勇于直言的铮铮铁骨。

万历四十一年(1613),陈玉辉巡视北京三十四卫屯政。当时京卫“承平日久,逃绝几半,外卫屯军,总于抚臣,强半拨入城操,尺籍之混淆久矣。”为此,他新补屯军五万人,并提出坚持征缴屯粮、复屯官管操之制、定屯营操赏之费

等方法,使得卫兵军容得以刷新,军队战斗力得到重新凝聚。

万历四十二年(1614),陈玉辉巡察南京屯田事务。面对屯官所用非人、拖欠屯粮的现象,他又上疏直言兵部选拔屯官“不询才望”,仅“挨序填补”,而始作俑者即是武选司郎中马烨如;并力主恢复原来的制度,采用遇缺选补之法且人选不限于在本卫之中。神宗将此疏转飭兵部给予采纳,申明旧制,更正职掌,明确管事之期为五年。

在察知南京周边池河地区所设飞熊、英武、广武等三卫所武官家族凭借世居之威,鱼肉军余(即军户余丁),侵占屯田的行为,陈玉辉愤然上疏:“臣誓不清此田,不渡此江!”他不畏繁难,严峻执法,行动果决,不仅追出原任游击、指挥、千户、百户等一百六十二员侵占的田地二万七千余亩,还对其中积恶最稳、占种最多的游击韦宗昭及其二子两次提解,追出侵占屯田二千二百余亩,并请旨置之干法。在大力清理夙弊之后,陈玉辉还提出加强对三卫的管辖,归为附近有司带管,并将现有指挥、千百户尽调别卫,另选调补。

上述整肃两京屯政的做法和措施,

都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,“旨下如疏,屯卒欢呼”。陈玉辉有关屯政方面的系列举措,完整收录于《南京都察院志》卷之十六《职掌九》内(该内容即为其所著《屯田纪略》一书)。在当时屯务废弛、侵占成风的大背景下,陈玉辉的整饬行动实属难能可贵。

而更为可贵的是,在当时公认“巡屯三载,膏田、华厦几遍邑里”的情况下,陈玉辉始终洁身自好,不取一毫。完成南京巡屯任务后,他转而按视上江(即今安徽一带)。按例官员在出南京城转赴他任所时,都要向江神祷告一番,祈求出行平安。陈玉辉在拜告时说:“臣今日行矣,屯中如持一文钱东渡扬子江,江覆之;西渡鄱阳湖,湖覆之。”意思就是,如果我身上带了一文不义之财,往东过扬子江时便会翻船落江,往西过鄱阳湖便会翻船落湖。

离任时,他竟连路费都凑不齐,同僚只好凑钱相助。其子陈龙锡述其父生平“片石支舸,门如秋水,橐如磐,俸人不办买山,仅此图史签轴相追随于宦途客津”。由此可见,陈玉辉始终坚守着清廉自矢的为官从政本色。



陈玉辉故居 (万成哲 供图)

闽南掌故



筹划城守 得祀乡贤

万历四十四年(1616)、四十五年(1617),陈母和陈父相继过世,陈玉辉回乡守制,居住在其所构造适斋内。当时福建沿海倭警频发,福清、南安、诏安等地均受到倭寇的骚扰。面对危情,家居在乡的陈玉辉与时任惠安知县严自完谋划加固城墙。

陈玉辉认为,加强城守并无明确时限,普通百姓“朝之谋生,不及于夕”,若强行征调他们守城,倭寇还未到来,百姓就已先饿死。因此,他提出由县里乡绅和富户按田亩出钱,有僦雇佣贫民守城。如此协力固守,可一举而两得。这一建议上报得允后,众皆大悦,县城的防御力量因而得到大大加强和巩固。何乔远为此专作《侍御荆碧陈公守城惠德颂碑》一文,称颂陈玉辉惠民之德。后来,因有功于民,经崇祯间惠安邑令赵玉成呈请,陈玉辉得以入祀惠邑乡贤祠。

再任御史 获誉“铁面”

天启二年(1622),陈玉辉起任北京贵州道监察御史,随后主理都察院河南道事务,与吏部考功司考功郎一道,负责癸亥年京察,掌管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政绩。他一如往日清廉自守,对私人信件、清托信函一概不收,因此有“铁面御史”之称誉。然而,在任五月后,陈玉辉卒于官。在今惠安陈玉辉故居内,挂有一副对联“南国驰名称卓绩,中流砥柱见丹心”,正是其一生行迹贴切的写照。

陈玉辉的严明家训与清正本色,深刻地影响了后代。其子陈龙岩,清顺治五年(1648)恩贡,受职通判,历官石阡推官、思州府同知,摄黎平府,迁思南知府。到任之地,建城垣,修文庙,垦土田,招流亡,政绩斐然,有“五郡清风第一”之誉。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五十称其“宦辙所至,涤夙弊,革陋规,一切苞苴馈遗悉拒绝。素以南阳朱季自比,力锄奸慝,爱护孱民,事无巨细,悉出手裁。”陈龙岩后官终江宁知府,亦卒于任上,后同祀惠安乡贤祠,赓续了乃父的清廉本色。

文以载道 著述不辍

在勤于政务的同时,陈玉辉还与邹元标、罗大紘等往来密切,以实践道学为己任,推崇理学,改建复初书院,著成《文江政纪》一书。陈玉辉另著有《留台疏稿》《屯田纪略》《适适斋鉴须集》《积庆家乘》《存耕录》,以及《四书说》《六曹经制》《御倭备边》诸稿。其子陈龙锡回忆他“每深夜篝灯,捧案恐卧,虽霜积襟袖,犹著作为不倦”,即便风雨客途亦未尝稍辍。

目前仅见陈玉辉所著《适适斋鉴须集》(清康熙十一年刻本),计有七卷:卷之一为语录,卷之二、卷之三为序,卷之四为记、文、疏、议,卷之五为祭文、行略、志铭、赞,卷之六为书、启、看语、谕,卷之七为诗,文体多样,内容丰富。特别是卷一中所载语录计170则,收录古人治学修身之道、为人处世之理、名臣行事之迹以及居官警言等等,兼有个人点评,从中可见陈玉辉深谙宋儒义理之学,既是其处世指南,亦可窥见一代廉官之精神养成。

对于陈玉辉的事业和文章,明崇祯年间惠安知县赵玉成评价其文章:“先生举进士,为令文江,有为令之事业,则有为令之文章;已擢为台官,有台官之事业,则有台官之文章;持斧按屯南中,有按屯之事业,则有按屯之文章。”说是,陈玉辉所写文章都是随事而作,绝非空谈之作。此论可谓中肯贴切。何乔远也称:“予每诵其吉水之政与南台经画屯田马政之议,在在为国家硕画,为生氓谋久远。”这在明代中后期朝政日渐衰微、官吏腐败成风的大环境下,实属不可多得。

纵观陈玉辉一生,始终深怀救焚拯溺之念,清廉自矢,刚正不阿,其为人为官之道,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深入追寻和纪颂。(刘晓平/文)